

论西方生命思想的理论进路及其意义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在关于人类自身的诸多问题中, 生命问题是最核心和最重大的问题, 对人类具有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意义, 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和精神成果都可以归结到生命这一前提性因素上来。从西方生命思想的理论进路来看, 不仅不同时期的生命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分野, 就是在同一时期也有各种观点的尖锐对立; 不仅在生命本体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对生命的价值判断更是众说纷纭, 存在着非常复杂和充满对立的思想形态。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主张把一切还原到生命, 标举生命的本体意义, 呈现出对生命极为丰富的哲学省察。

关键词: 生命; 西方生命思想; 生命价值观; 生命本体观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6-0727-06

在关于人类自身的诸多问题中, 生命问题是最核心和最重大的问题, 对人类具有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意义, 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和精神成果都可以归结到生命这一前提性因素上来。对生命问题的困惑与求解, 一直占据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敏感的位置, 由此形成人类丰富复杂的生命思想。所谓生命思想, 是指人类在各个时期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对生命进行理性思考的观念体系, 是超越对生命的感性认识而上升到哲学层次上的思想成果, 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是其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生命本体观强调对生命本源的探究, 追问生命所由何来, 是关乎对生命本身性质的认识; 生命价值观则是对生命应有价值的把握和判断, 关注的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生存价值及其意义。一般来说, 生命本体观是生命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 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往往离不开对生命本体的观照。但值得注意的是, 两者的关系又是极其复杂的, 并不表现为必然的对应关系, 相同的生命本体观可以派生出对立形态的生命价值观, 而相互对立的的生命本体观又可以通向相同的生命价值观^{[1][3]}。尽管在生命固有的复杂性面前, 人类似乎显得有点无能为力, 至今还无法给生命规定一个完整而又被公认的定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缺乏求解生命的热情和勇气。人类在这一最古老最复杂的问题面前,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思想脚步。

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石碑上镌刻着一句警言

“认识你自己”。人类认识自己的冲动最初是从生命开始的, 这不仅因为生命对人类来说是最现实的问题, 而且在人类思维能力和生产力水平都极其低下的情况下, 生命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存在物, 这些都促使人类探究自身的奥秘, 正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生命问题的不懈探究与追问, 才形成人类早期的生命思想。在西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就对生命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生命到底是什么及其意义何在, 或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把生命定义为感性直观的自然物, 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 并不是神灵或上帝的创造物(米利都学派); 或从关于数的理论出发, 把抽象的数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或最终实在, 认为感性事物只是数的摹本, 由此把生命看作是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和谐整体, 灵魂因具有神性而获得不朽, 肉体则只是偶然的, 是“灵魂的坟墓”, 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毕达哥拉斯学派); 或从感觉主义的原则出发,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 认为人的感性欲望和物质欲求都是出于人自身的本能需要, 无需由神来规定, 人并非单纯的自然物, 人的本质规定在于其社会性(普罗塔哥拉); 或从社会性和理性原则出发, 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把人定义为社会伦理动物, 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节制欲望和遵守德行(亚里士多德); 或从人的天性趋乐避苦的快乐论出发, 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寻求自然

收稿日期: 2009-05-20

基金项目: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 湘教通[2004]284)

作者简介: 吴投文(1968-), 男, 湖南郴州人, 武汉大学文学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艺美学。

本能快乐的动物,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满足肉体快乐和追求精神享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伊壁鸠鲁)^{[2](33)}。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些有代表性的生命观念,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看待生命问题上的歧异,不仅在对生命本体的认识上,而且在对生命的价值判断上,都显示出尖锐的分歧,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生命问题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并对此作过不懈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生命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以神性来否定人性,主张上帝对人的绝对统治权力,认为神的意志居于一切之上,与此相关,这时期的生命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浓厚的神学色彩。经院哲学从上帝本体论出发,认为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灵魂是生命的形式,人的肉体是生命的质料,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灵魂统辖肉体,决定人的本性。由于人的灵魂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具有神性,因而人性最终是由神性来决定的。人只有接近上帝,才能完善自身,获得生存的意义。这样,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独立性就被完全取消,上帝的尺度成为生命的最高规定。与此相应,生命的自然欲求和精神需要,就被一种外在于生命的神圣事物所决定,从而导致人性的压抑与异化,人离开自身的本质规定而成为上帝意志的表现,中世纪由此陷入“黑暗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冲破中世纪神学的迷雾,成为一个激活生命的时代。以人性否定神性,肯定生命自身的价值,维护人的主体性地位,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和原罪观念,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既然无法改变其本身固有的生物性特征,生命的自然欲望和本能需要就都应该得到满足。同时,生命的自然本性决定人在追求幸福和快乐的目的上都是一样的,因而人是生而平等的。但矫枉过正,又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把人的自然需要动物化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者把人性归结为理性,要求人性从神性的奴役中摆脱出来,恢复生命固有的尊严,确立生命的价值。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从时代的现实需要出发,表现出这种生命立场与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欧洲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近代以来的西方生命思想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合理内核的继承,基本上是沿着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理论路线发展的。“在近代西方思想家看来,人天生就是趋乐避苦的利己主义动物,天生就是现实物质利益的追逐者。这是回答人性问题的一个立足点。”^{[3](25)}人性问题与生命问题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有时呈现为

二合一的混合体,因而也可以理解为是回答生命问题的一个立足点。近代西方思想家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出发,已经意识到生命的多层面需求和复杂统合性,因此,一方面将人描绘为天生的利益主体,将自私和自爱当作是生命的合理欲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利他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生命的自然欲求驱使人去追逐个体利益,而理性力量又要求个体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理性力量表现出强大的统辖作用,使生命的自然欲求与社会的道德约束能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张力性的平衡状态,使生命的自然欲求服从理性力量的引导,既不至于流于放纵,又不受到过分的压抑,同时,理性力量也需要尊重生命的合理需求,这样才不至于异化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里不难发现西方近代思想家关于生命问题和人性问题的两个基本思路:一个思路是从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本性出发,以感性欲望为前提来论证人性的自私或善良,论证国家权力的必要性或社会制度的非人性;另一个思路是从人的理性本质和理性力量出发,以自发意志以前提来论证人性的内在规定,论证人的自由和幸福。”^{[3](26)}应该说,这种对生命问题和人性问题的理论概括是极有见地的,符合当时的思想状况。

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出现空前的信仰危机,一种普遍的悲观意识和迷惘情绪在整个社会弥漫开来,生命哲学由此应运而生。这是西方生命思想的重大转变时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的转向,提倡直觉思维,以此进行对传统生命思想的解构和颠覆,试图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解除现代人的精神迷惘和痛苦,实现对现代人的精神拯救。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强烈的生命形而上学探索意识,他们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主张把一切还原到生命,标举生命的本体意义。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唤醒现代人自觉的生命意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叔本华从直觉主义的原则出发,借助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界”概念,认为世界就是由“物自体”和“现象界”构成的。在他看来,“物自体”就是生命意志,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生命冲动,正是这种生命冲动构成世界的本体,而“现象界”则是生命意志的表象。他由此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生命意志的产物,无法通过理性去把握,直觉的重要性就因此表现出来,在他看来,直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有效方式。叔本华站在人生价值终极性的立场上,认为人生的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其根源就在于,人只要还活着,就必然被盲目的生命冲动所驱使,因而,“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

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4](25)}。叔本华生命意志哲学的悲观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又认为，尽管人生终究无法解脱痛苦和无聊，但还是需要有一种暂时摆脱苦难人生的出路，文学艺术就是一种合适的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叔本华极为重视文学艺术对于痛苦人生的补偿功能，在他看来，文学艺术能把人引入忘我的境界，暂时性地从生命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他把艺术称为“人生的花朵”，认为文学艺术能以直觉的形式达到“对于世界的本质那种纯粹的、真正的、深刻的认识”。^{[4](369)}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直接面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历史境遇，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意识，但得出的却是人生痛苦的悲观主义结论，最终迷失于生命意志的盲目冲动中。尼采不满于叔本华的这种悲观主义生命意志哲学，用“权力意志”来取代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把世界的本体归结为权力意志。他从权力意志出发，认为自我达到极度的扩张状态，就会出现超人，超人体现出权力意志的创造和超越精神，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创造和超越，在创造和超越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应该向超人迈进，但超人又并不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而是尼采标举的理想人格类型，是作为人生追求的方向和目标而存在的。在尼采看来，超人应该取代上帝而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之所在。与超人相对立的则是末人，末人已经完全失去创造的生命冲动，不再拥有强壮的生命力量，也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理性的压抑下已经异化为精神上的阉人。尼采通过对现代人精神特征的观察与分析，认为末人也就是现代人，是已经堕落或下降的人，这正是他所竭力拒斥的人格类型。尼采对超人的向往和建构，对末人的拒斥和消解，都是在向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挑战，他由此宣布理性的上帝已经死亡，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因此理性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都需要重新估定。在尼采看来，传统的理性价值观念以压抑人的生命为其本质，生命则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上帝对人统治秩序的建立直接根源于传统的理性价值观念。尼采以非理性的直觉方式竭力颠覆传统的理性价值，这种理性价值在其权力意志面前已经荡然无存，因此生命的价值也必须重新定位，应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生命价值观。尼采以超人的姿态告诫世人：“生命，存在中最好说明的形式，是蓄积冲创的意志——每件事物的目的，不在于保守而在于成长增大。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本质是追求更多的力量；所有最基本最深沉的事物都是这种意志。”^{[5](93)}尼采把生命纳入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动力系

统中，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追求力量，是和创造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的“酒神精神”概念其实就是力的象征，狂热生命力和无限创造力的象征。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结合，就产生悲剧艺术，但悲剧艺术的实质则还是酒神精神，其目的则是酒神的再生。

“在悲剧中，个体解体的痛苦被复归世界本体的快乐所融化，因此带来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醉态。而悲剧的消亡归于酒神精神的丧失，即肤浅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出现。”^[6]与叔本华一样，尼采也非常重视艺术的功能，其根源就在于生命本身的需要。在尼采看来，艺术是生命的表达，通过艺术，可以重获生命的意义，同时，艺术又是权力意志的直接呈现，权力意志则成为艺术的尺度，两者具有同一性。因此，他要求用艺术家的眼光体察科学，用生命的眼光审视艺术，把人生艺术化，把艺术生命化；另一方面，艺术又要贯彻权力意志，充盈酒神精神，体现超人意识。尼采更进一步认为：“真正的文化便是生命中各种力量和形式所结合的统一体”^{[5](178)}。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尼采否定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而肯定悲剧精神的人生观，他和叔本华的区别也在这里表现出来。叔本华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从其生命意志的消极立场出发，把悲剧性作为人生的清醒剂，对人生采取退缩和出世的态度，认为无欲无求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尼采则从倡导超人意识的立场出发，把悲剧性作为人生的兴奋剂，认为人生的悲剧性能够在艺术中得到升华和超越，从而激发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达到生命的审美关怀。

法国思想家柏格森是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都归结为“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也就是他所谓的“绵延”。在他看来，生命冲动虽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物，但却是真正的实在，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或内在的推动力，创造宇宙的一切，因而是万物的本源。直觉是抵达生命冲动的唯一途径，通过直觉，人不仅能体验到自身的生命冲动，而且可以感受到世界万物的生命冲动。生命冲动的本质乃是创造，这种创造本质是与人的直觉或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生命冲动实则是生命本能化的自我或精神化的生命本能，表现为一种流动的生命状态，也就是所谓“生命之流”，在时间上则表现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流动不居，生生不息，但又决不重复自身，而是处在永恒的创造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绵延”。正如他所指出的，“生命的特性永远处在实现之中，决不会完全实现”^{[7](15)}；“在生命进化的前方，未来的大门一直敞开着，生命进化实质上是起始

运动永不停息的创造。”^{[7](84)}。柏格森把生命冲动的本质归为创造,意在确立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价值。在他看来,人作为一种高级生命形式,处在永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中,人在生命冲动的推动下进行不断的自我创造,因而确立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独特性也得以确立,自我的意义也由此显现。由此出发,柏格森把生命的意义归为行动,认为生命必须化为行动才有意义,生命本身与行动具有同一性,行动乃是生命的本质所在。他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行动。”^{[7](233)}但行动并不是盲目而为,而应该进行选择,只有选择才能确证人的主体性存在。柏格森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因而必须有所选择。实际上,我们总在不停地选择,又在不断地舍弃许多东西。在追求和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我们所成和所能成的全部脚印。”^{[7](80)}正是基于选择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柏格森将自我分为表层自我和深层自我,将社会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将道德分为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将宗教分为静态宗教和动态宗教,认为生命进化的理想途径应该摒弃前者而趋向后者,人类循此途径才能达到高远的境界,实现人性的完善,因此,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应该建立在后者上面。这样,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就被赋予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理想色彩。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境遇,是整个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向。这是由西方现代社会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状况决定的。西方社会进入 19 世纪下半期后,面临着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及其价值体系受到普遍的质疑。理性主义由于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去看待人,从而把人规定为理性的人,同时用理性的普遍性、抽象性去排斥个人的情感、意志、体验、创造、行动以及个性,这样,具体的感性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人被理性的人所取代,个体的生命也被理解为僵化静止的状态。因此,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命存在,重建符合人性需要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生命哲学正是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的,试图寻求恢复人性自由和重建社会规范的途径。贬抑理性,推崇直觉,生命至上是生命哲学的共性,不管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都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生命的本体既不是物质化的实体,也不是精神化的理念,而是一种盲目的和不可抑制的生存意志、权力意志或生命冲动。生命冲动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或内在的推动力,是创造宇宙间的一切存在的本源。人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物种的高级生命形式,更是一种主观化和精神化的生命。人的本质就是人不断地释

放出来的生命冲动。人在生命冲动的推动下不断地进行自我创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一种生命冲动的聚合体,同时也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动物”,人是一个无限的生成体与创造过程。这样,人自身的独特性得以确立,人在宇宙中的意义与价值得以确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生命哲学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判断,是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哲学审视”^{[3](88)},因而在当时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危机和意义危机的思想背景下,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

生命哲学发展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现新的变化。1879 年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由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建立,标志着心理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之前,心理学始终包含在哲学之内,因为缺乏科学实证研究的必备基础,也就不可能摆脱传统哲学心理学的思辨习气。因此,西方传统的生命思想也主要表现为哲学思辨,缺乏心理学上的充分依据。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说出发的生命思想,是在以实证科学为前提的现代心理学层面上展开的,因此与传统的生命思想判然有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大量临床诊断的基础上,从无意识的理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整个心理活动是一个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无意识占据主导地位,但因其居于心理活动的最深层而不易觉察。弗洛伊德断言无意识乃是整个心理活动的基础,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其核心内容表现为性本能或性冲动。在对生命问题的探究中,弗洛伊德一直坚持性本能在生命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说:“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基本本能,基本本能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其目的是满足某些基本需要。”^{[8](212)}他最初把基本本能划分为性本能和自我保护本能,后来发现人类身上还存在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本能,因而重新把人类的基本本能划分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划分,性本能和自我保护本能都包含在生存本能里面,而死亡本能则是指人的各种破坏性和毁灭性欲望。生存本能表现为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创造进取本能,其目标在于维护人的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死亡本能则表现为攻击与毁灭的破坏性本能冲动,其目的在于毁灭人的个体生存和分化乃至消灭群体生命,瓦解群体延续。不管是生存本能还是死亡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人的无意识欲望的表现形式,而其基本内核则都是性本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弗洛伊德把人类一切文化创造的根源都归结为性本能的推动,认为无意识欲望不仅在个体的生命活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在人类的文

化创造活动中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显而易见，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决定论立场带有浓厚的泛性化倾向和非理性主义色彩，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在无意识理论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个立场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意识到人的本能需要不能过度压抑，同时又看到理性原则和文明规范对于约束本能需要的重要性，他对人格结构的划分就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在他看来，无意识活动是心理活动的“原发性过程”，而意识活动则是心理活动的“继发性过程”，前意识活动处于过渡阶段。整个心理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都来自于无意识活动。因此，弗洛伊德又把人的心理活动机制归结为一个动力学系统，认为这一系统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格结构。本我是生命最内在的规定，是生命力的核心所在，它包括人身上各种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根本特征是追求快乐和满足，始终遵循着原始生命所固有的“快乐原则”，故而不受任何理性原则和道德意识的束缚，体现出人身上趋乐避苦的天性和遗存的生物性特征。自我从本我演变而来，充当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它一方面要实现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得考虑现实环境和社会需要，接受理性原则和道德意识的约束，遵循社会规范和现实规则，其主要职能是运用各种社会规范对本我的本能行为施加压力和进行调节，用“现实原则”来取代本我的“快乐原则”，“就像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一样，自我主要考虑的是安全。”^{[9](578)}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并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职能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代表人类的良知和理想，因而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弗洛伊德说：“由我们看来，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9](52)}每一个人的超我都要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体现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其理想目标，因此从本质上说，超我是对本我和自我的升华，表现出社会性和文明化的特征。弗洛伊德这种对心理活动和人格结构的划分，并不表明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存在绝对分明的界线，而是相互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动力结构系统。

综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内容，不难发现无意识理论是其最根本的内核，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大厦是全部立于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的。如果深入探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源头，可以发现自近代以来的德国哲学思想对弗洛伊德有较大的影响。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希纳等思想家都提出过无意识的理论猜想，但因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实证研究

和理论分析的层面上，因而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些思想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弗洛伊德更大的影响来自德国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认为，无意识的非理性的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质，人的一切欲望都根源于此，而在人的各种欲望中，性欲乃是最根本的，叔本华视之为欲望中的欲望，认为是生命意志的核心，人生的痛苦就来自生命意志的冲动。因此，摆脱痛苦的有效途径，就在于用精神升华的方式，如从事哲学、艺术、宗教的方式来净化生命意志。弗洛伊德曾承认自己的理论创见得益于叔本华生命意志哲学的启发。尼采继叔本华之后，用权力意志取代生命意志，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权力意志，法国思想家柏格森则进而认为世界的本质就在于生命冲动。不管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都具有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其精神实质都在于对人的无意识欲望的极度张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显然与此相通，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生命哲学具有内在的联系。

综观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生命思想，会发现生命问题是人类始终在不懈探索的最为重要的主题。对人类来说，生命是最为现实的问题，是人类取得一切进步与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最为直接地显示自身的本质，人类的终极眷注乃在生命自身。然而，这又是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人类始终处于对自身生命的困惑之中，但对生命的探索又并不因此而止步，这就形成人类丰富芜杂歧异互生的生命思想。确实，在人类面对的各种问题中，对生命问题的分歧最为突出。生命观念的对立与冲突，成为思想史上各种流派的重要分野。对生命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的分歧上。生命的本体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最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时代思想背景的差异，个体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乃至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知识结构等因素，都会造成人们生命观念的歧异。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的关系本来就异常复杂，两者并不表现为线性的对应关系，而由于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就使人们的生命观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这是思想史上一个普遍的事实。从西方生命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不仅不同时期的生命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分野，就是在同一时期也有各种观点的尖锐对立，不仅在生命本体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对生命的价值判断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着非常复杂和充满对立的思想形态，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

的哲学省察。即使人们有时能在生命本体上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但由此出发的生命价值判断却又大相径庭。这些都表明生命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人类来说,生命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异多端的价值系统,对生命的价值判断更直接地显示出人的本质。价值判断的尺度总是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处于不断的流变状态,由此决定人们在生命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共识,这在西方生命思想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所处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人们对生命问题的探究也会比此前更为深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生命问题的分歧可以就此消除。相反,人们可能会更多地意识到生命中存在的可变性因素,尤其是生命价值系统中的可变性因素,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行不同的理解,因此,人们对生命问题的分歧不但会依然存在,而且可能还会更加激烈。毫无疑问,对未来的人们来说,生命仍然是一个无尽的话题,对生命问题的探索是与人类同在的。

参考文献:

- [1] 钱志熙. 唐前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 [2] 陈修斋, 杨祖陶. 欧洲哲学史[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欧阳谦. 20 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4]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5] 汪顺宁. 权力意志与艺术——论尼采美学的基本问题[J]. 哲学研究, 2002, (4): 61-67.
- [6] 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7] 弗洛伊德.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 [8]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 [9]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western life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WU Tou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mong questions concerning human existence, life is the most vital one, which is of the most direc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all the cultural inventions and the spiritual achievements people are triggered by to this premise factor. Judg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the western life theory, we could see not only the sharp differences of the life theor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but it the great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even in the same period. Moreover, a lot of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life essence,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has not reached its consensus. Arthur Schopenhauer's life philosophy, Nietzsche's the will to power philosophy, Henri Bergson's the life impulsion theory and Freud'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ll of which can lead us in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modern people, helping us to go back to the originality of life, and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life, which presents a tremendous philosophical inspection to the abundance of life.

Key words: life; western life theory; life value; life essence

[编辑: 颜关明]